



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力量如何重塑国际政治

世界经济论坛地缘经济全球议程委员会¹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全球影响正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为了理解这一进程，世界经济论坛的地缘经济全球议程委员会（The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Geo-economics）组织多位专家讨论并发表了有关中国地缘经济影响的报告集。本期摘译其中的两篇文章。作者们指出，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及其影响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道，这反映了它们对自身利害得失的判断；近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转型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冲击，并改变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从“溢出效应接受者”转变为“溢出效应产生者”，中国决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全球的，这给中国的决策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一篇 引言

马克·莱昂纳德²

第二篇 转变中的中国增长战略及其地缘经济影响

道格拉斯·瑞迪卡尔、易明、迈克尔·列维³

¹ 英文原文载于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此为中文摘译。

² 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

³ 道格拉斯·瑞迪卡尔（Douglas Rediker）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亚洲研究主任，迈克尔·列维（Michael Levi）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地缘经济研究主任。

一、引言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大故事是关于增长、出口和投资的，那么下一个十年的故事将是关于中国创造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

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还是正在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像很多人害怕的那样推翻现有体系，而是利用其经济实力与世界相联系，并发展出一系列将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关系和制度。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与以条约、国际法和主权国家联合为基础的西方领导的多边机制有着不同的结构。北京更倾向于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时也会组织地区性峰会。

相比经济增长而言，这种地缘经济计划更加昭示着“中央王国”的真正复兴。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北京正在建立一整套范围很广的通向中国的管道、桥梁、铁路、航线和电缆。通过使自己成为每一个地区的重心，中国赢得了影响力和说服力。中国的目标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提高生产率和输出过剩产能，这会使中国成为更广阔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系统的核心，那些与这个核心联接不够紧密的国家将被边缘化。这种秩序形成的速度几乎和中国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同样惊人，但是它并没有“宏伟计划”，其建立是渐进且有弹性的。

中国的地缘经济工具箱里有五个关键工具：贸易、投资、金融、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基础设施联盟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提出。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具有改变不同地区经济、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黯然失色的潜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4年出口商品总值达到惊人的2.3万亿美元。它有着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已经从一个廉价商品来源国变成了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仅在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就对外投资了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政府声称“一带一路”计划将为65个国家创造2.5万亿美元的额外贸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预算规模也相当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援助。

世界各国对中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反应

各国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地缘经济计划的方式迥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一些国家尽可能将自身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中东都可以发现。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亲密的老牌盟友，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关系正转变为一种新的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中国从地区强国走向世界霸权。

由于看起来友好且不附加条件，中国的投资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非常受欢迎。然而，对发展经济关系的最初激情现在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商品需求放缓、中国劳动力输入和腐败的不满。

在中东，许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活跃的政治角色，以抗衡美国的霸权。但这是北京极力避免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南亚正这样做，却面临深陷阿富汗的危险。

另一种应对之道是美国、亚太国家和欧洲所采用的，即一方面尝试防范中国的战略实力，另一方面仍然希望利用经济机会。

多年来在亚洲和西方始终存在一种政策共识，其中融合了制衡、接触和塑造。总的来说就是对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行清晰的划分，制衡用于军事领域，而接触和塑造用于经济领域和国际组织中。

欧洲人目前用的还是这种方法，即通过其亚投行的成员身份增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且鼓励中国投资，同时却继续实施武器禁运，并讨论尊重海洋法治的必要性。

美国则日渐改变它的做法，开始转向更加强硬的立场。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其相关政策，美国寻求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有效地制衡中国。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美国副总统使用了“负责任的竞争”（responsible competition）一词——与之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相去甚远。

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里的赢家和输家

那么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对世界秩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谁将是胜利者？谁将是失败者？

在现行轨道上，一个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的主要受益者当然是中国及其伙伴，前者能够找到新的市场，后者能够在基础设施和投资上得到帮助。欧洲国

家从通往亚洲市场的新的陆上和海上通道中收获甚丰。但是，这有赖于欧洲国家的团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力量与中国谈判，而不是被北京分而治之。

在失败者或者至少是收获相当少的国家的榜单上，日本位居首席。它在东南亚的阵地会输给北京。即使日本通过自己的基础设施计划与中国抗衡，最终也是帮了中国的忙：日本仍将是一个岛国，而中国的连通性只会变得更高。俄罗斯从中期看也会丧失在中亚国家的阵地——即使短期内它还是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主要安全提供者。印度也担心自己会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邻国输给中国。这些国家可能最终会寻求更强有力的手段或者新的影响力，来减少对华关系中日渐增长的不对称性，从而找到和中国重新谈条件的方法。

当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容易使国家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并且引起周边小国的焦虑。

最大的压力点之一可能是跨大西洋的关系，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正在日益被分化，这体现在围绕亚投行的争吵中。在华盛顿，决策者将在亚洲的自由主义秩序和美国的主导权看作一回事，而欧洲人倾向于将两者相区分。

一个更少被研究的问题是企业在如何在一个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里活动。大多数产业价值链的大多数主要方面都通过或者进入中国的贸易轨道。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为了进入梦寐以求的中国市场已经以中国的游戏规则为准。大多数产业供应链整合了中国的原材料或者零部件。一些企业严重依赖中国的需求，因而变成了热切的“中国通”。但是企业也可能采取避险措施，例如，不放弃它们在西方或者其他地方的市场或机构。私营企业可能会寻找使投资多样化和减少曝光度的新策略来确保他们在未知水域的航行安全。

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在短期和中期的发展步伐和性质，以及任何一方面的变化可能对中国的全球性地缘经济角色产生的影响。表现欠佳的投资可能会让中国投资者不愿承担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趋缓时。中国GDP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连锁效应，这在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优先选项上会有潜在表现。在其经济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会如何发展？在一个科技、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不止意味着经济活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缘政治力量的世界上，中国的经济还会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通过促进新的制度、规范和设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国际体系。

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出现可能不会对西方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取而代之，但会削弱后者的中心地位及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同力量中心的产生会给全球治理带来什么影响？平行的制度之间也会竞争吗？既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将如何应对新的形势？这些将是界定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态的问题。

二、转变中的中国增长战略及其地缘经济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和贸易的超级大国，其规模和冲击力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都是惊人的。自 2009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大致翻倍，如今正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还在增长的国内市场，也是外来直接投资、廉价出口商品的来源，其增长极大刺激了世界经济发展。并且，这种经济力量还带来了地缘经济上的影响。

然而，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初期，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决策技巧的担忧让乐观的情绪显著且快速地转变了。对于那些越来越依赖于正受到质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国家来说，它们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会变成经济上的累赘还是优势？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变，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也会发生转变吗？

转变中的中国经济

在 201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的前几周，许多新闻头条都提到 IMF 成员对于来自中国的风险扩散的担忧。存在疑点的中国政府增长预测，不可预知的汇率波动，股票市场的暴跌，以及突然变得不可预测、不可信赖和不稳定的经济决策，这些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决策者需要应对的最大的全球经济风险。

当全球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人于 2015 年 10 月会面时，中国从一个指责欧美政策失误的“溢出效应接受者”变成了一个“溢出效应产出者”。放慢的增长速度、货币冲击以及经济从基础设施与投资主导向消费和服务主导的转型，都有可能威

胁那些依赖于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支出与投资的经济体。

溢出效应

要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这种转变带来的跨国经济影响，现在为时尚早。其间的联系相当复杂，目前的认识仍远远不足。不过，依据经验法则，IMF 预测：中国增长每下滑 1%就将导致亚洲增长下滑 0.3%，在东盟成员中，这种下滑可能会有 0.6%，在东亚甚至会高达 0.7%。但是，即便这种宽泛的预测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缺少确切数据来区分哪些影响是增长缓慢导致的，哪些是经济再平衡所带来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将逐渐转变为服务业与国内消费为主，其他过于依赖中国旧的增长模式（作为商品和生产资料生产者）的经济体将需要努力转变自身的增长模式。

并且，尽管在金融方面的联系与风险有限，2016 年开始后，中国股票市场的下跌显然造成了全球连带影响，以至于美国的投资者也开始注重应对中国的市场、货币波动与政策选择。

中国的国内经济模式、财政稳定性以及政策反应的效能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增加了私人资本外流的压力——中国公民与机构都在寻求投资多样性，寻找能够安心放置自己金钱的安全港湾。这导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要保持货币的稳定性，中央银行只能花费巨大的储备金（从 2015 年 6 月以来就超过了 4500 亿美元）。然而，人民币仍然疲软。这些货币溢出效应波及地区贸易伙伴，它们的经济与国民财富受到了直接与间接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决策选择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的、财政的与货币的健康状态，这些国家被迫应对它们很少参与却从许多层次上受影响的决定。

中国自身变成了引起混乱与风险的外部因素，这是中国领导层和决策者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情况。中国在经济和财政上的决策一直都明确关注国内利益，但不管喜不喜欢，这些决策现在都拥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这代表了新的高度不确定的领域，需要逐渐地在中国的决策过程中被理解和吸纳。

中国地缘经济影响的结果

增长放缓、市场不稳定与越来越多的溢出效应会导致政治反弹，可能增加其

他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从而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针对国内增长目标做出的经济和财政决策因而会直接影响中国在海外的经济与战略影响力。

有理由认为，中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受中国影响国家的构成。例如，那些依赖中国支撑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口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不再紧密，因此会有能力或被迫去重新思考经济上、财政上和政治上的决定，以反映新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越来越注重内部带来的增长而不是出口导向贸易，中国参与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和经济制度的动机和议程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与排序。人们已经开始争论：一个较以往更少依赖贸易而更加注重国内经济的中国是否会在国际经济决策中变得更加强硬。然而，中国对于参加区域合作的兴趣不减，例如TPP，这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悖。

经济治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力量不仅转化为一时的影响，也让中国能够开始设立机构，把经济实力和更广阔的战略与政治目标结合、集中起来。这在国际投资竞技场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中国运用官方部门的资金，通过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等发展基础设施项目。

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走弱和再平衡可能会加强这些举措。随着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放缓，中国抓住机会出口工业产能过剩的部分，例如建筑业与炼钢业。相比于双边方式，通过多边机构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被认为更能减少政治摩擦。这些新的机构将提供更好的可预测性、透明度和可靠性，让中国过剩的产能被国际社会有效地利用。然而，不管是这些新项目的规模与速度，还是当接受国发现从这些项目中得利的是中国公司和工人、不是自身时可能产生的抵制，都使上述策略的效果受到质疑。

结论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引擎给全世界带来了利益，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将越来越造成全球性的冲击。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可能会使一些过于依赖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的经济体受到伤害。人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股票市场和金融部门，这给不习惯于理解其决策的全球影响力（这些决策迄今被认为仅仅是国内的）的中国决策者带来了全新的、未知的挑战。中国逐步向世界经济中心靠近，同时也向管理世界贸易、商务和资金流动的制度和规则的中心靠近，这意味着全新的机遇与风险。

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不能再声称自己是其他国家政策选择的被动接受者。如今，全球都能感受到中国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政府应对这种新角色、新责任的态度将直接决定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展方向。

（于舒婷、何婉筠摘译，归泳涛校）